

# 神居胸臆

孙郁

来。肖复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与孙犁通信,所涉时风、创作、学问诸事,都语带真意,所言所感,颇有古风。肖复兴说他与柳宗元有几分相近,是有些道理的。柳宗元比韩愈的可爱,是能从小处体味生命,不必装腔作势,徒作空泛文章。而那时候的文坛,充塞浮躁之音,争名于朝,渔利在市,如今思来,彼时显赫的存在,多已经灰飞烟灭,几无踪影。倒是在文坛边上的孙犁的片言只语,还被人记着。我在他与卫建民的通信里,也看到心绪的浩茫之状,他谈历史,言读书,都是冷视角,又不以导师自居,在什么地方令人想起鲁迅与青年的交往的情形,真真是清风朗月一般。

我们说孙犁是一面镜子,还因为对于工作的执着。宋曙光回忆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历史,能够感到他的用心和智慧。先生办报,有一股文气,但又非旧式京派副刊的绅士气,而是流动着泥土气的。他熟读鲁迅,也由此接触野史笔记,偶也浏览域外作品,便知道一个报人要输送什么,拒绝什么。既聚焦时代,又回望历史,于是版面上常有率性之文,博雅之音。五十年代,就扶植了一批新人,七十年代末,重办文艺副刊时,策划选题,介绍作者,都看出不寻常的眼光。他对于新潮的东西有时不以为然,从谢大光、冉准舟等人的文字里,知道在文坛风雨中,一个真人的风骨。在功利主义泛滥的时期,文艺周刊保持了一股安静之气,实属难得。我觉得对于八十年代前后的报纸副刊,应做一点系统梳理,这期间,天津日报副刊的分量,是不可忽视的。

与孙犁一同从旧社会走来的一些作家,后来多只是定格在往岁的经纬中,不再进步了,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生长。因为厌倦于单一思维,便从前人那里受到启示,在古今中外的诗文中寻找思想之光。于旧书中浸泡久了,落笔也染有苍凉之气,句子简约,驳杂多趣,郁然有彩。辞章里的思想的维度增多,也知道身边流行的东西,多为泡沫,不过是过眼烟云。他与小友们交流,坦言自身的感受,不以人爱之而爱之,弗因世苦之而苦之。笑着沧桑,独立滩头,可谓是风雨难动的有定力的人。

由此,他也成了文坛少见的寻路者。但这寻路,不是追风,而是以退为进,生命哲学里有许多逆世的东西。比如辞章方面,同代人是以新为荣,而他则回到传统的文脉里。六朝的短札,唐人的散论,宋人的笔记,都在笔端有所折射。得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之味,有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之音,陆龟蒙《野庙碑》式的小品和罗隐的《英雄之言》风格,也是有的。这些文体有别,指向不一,虽不及周氏兄弟通透,而思虑灿然。古人气脉,在他那里渐成新调,能写意,多素描,善议论,词语在流转中百态顿显。此类本领,新文学家多已丧失。采撷古人异彩的时候,也剔去言了士大夫气,其短篇之作反而有了新鲜的味道。

《文心雕龙》说一个人的文章好,其中一个原因是“神居胸臆”。这“神”当包括神思、神理、神采吧。它们有时散在别处,在静默中方可得之。西洋人有一种修炼叫“神操”,乃提升自我心灵功课。一般是在省察、默想、默观中进行。中国人多没有宗教观,而像曹雪芹、鲁迅等人的文字有几分这类的神气,他们勘破俗界,由明见暗,精神是高远的。细想一下,孙犁亦略带此风,他在喧闹的世间,辟出一块无声的园地,让飞动的思绪起舞着。文字仿佛冬夜的微火,引人到有光亮的地方去。这是一个常人不及的境界,大凡有此境界者,则物我两忘,似乎是一箭之遥,“离离如星辰之行”。我们追之而难及之,唯有体味、感慨而已。

最近一个时期,研究孙犁的书,许多是他生前的小友所著。段华的《孙犁年谱》,宋曙光主编的“我与孙犁”丛书,都是不可多得的出版物。当年的小友,多已进入老年,所忆所感,在斑斓的画面外,不乏沧桑之感。这些人与孙犁有笔墨之交,有的是同事,有的为读者,有的则是他的作品。天津人民出版社的“我与孙犁”丛书收有五位作者的书:谢大光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,肖复兴《清风犁破三千纸》,宋曙光《忆前辈孙犁》,冉准舟《欣慰的回顾》,卫建民《耕堂闻见集》,提供了认识先生的一手资料。一个作家离开世间二十多年,还有如此多的人怀之、念之,说明了有一种引力在,这引力穿过了时空,吸引了数代人。孙犁没有汪曾祺那么悠然,也无张中行那样哲思气,但他的冷峻和忧郁里的悟性,成就了另一种风格的诗文,与同代人不同的是,保持了战士的本色。这种独特性,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。

读孙犁书信与他的一些小友的回忆文字,旧影历历在目,觉得先生是一面镜子。对照它,便看出人性的深淡



「文汇报笔会」  
微信公众号

范用曾说:“我的办公室对门是洗手间,朋友们封我为‘文史馆长’。‘文’者,‘闻’也。我如入芝兰之室,久闻不觉其香,客人陪闻,我很抱歉……有一天,真的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,老人家居然登高(五楼,没电梯),赠我一书一画。我从不跟人讨字画(王世襄、郁风除外),更不敢向启老讨,看他吃力的样子,我不知说什么好。”通过这段话,可以看出他与王世襄和启功的朋友关系。

启功(1912—2005),字元白,满族,北京市人,清代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。他是中国当代书画家、古典文献学家、鉴定家;王世襄(1914—2009),字畅安,原籍福建福州,生于北京。文物专家、学者、收藏家。这两位都堪称奇人。启功的书法在市场上曾经卖到好几万元一尺,但他本人并不贪钱,范用找他为一些商家或城市公共设施题名,他坚决不要回报。王世襄一生好玩,养鸽子、鹰,玩蛐蛐、蟋蟀,溜猫狗,收藏明清家具,而且是美食家,他做的红烧大葱,那叫一个绝!去范用家做饭,所有家伙事和调料都要自己带——可是他玩,却玩出了学问,一些别人不研究的学问,自成一家,名满天下。范用大爱这二老了,潜移默化,趣味日近。比如喜欢书画,尤其是文人画、文人字;再如能烧几个好菜,吃食不讲豪华排场,但讲究品位……

夏衍曾说:“范用哪里是开书店啊,他是在交朋友。”范用说:“我交朋友,还是为了出书。”在范用这里,再好的朋友,最后还是落在书上。他希望两位老先生都能把自己多年写作的文章集中起来出书。没想到第一本却是王世襄的《北京鸽哨》。先是,1988年2月,王世襄给三联书店写信:“拙稿《北京鸽哨》遭删已全部重抄,改成简体字。对其出版,本人无任何要求,只希望今年8月间应香港大学之邀,前往讲学,可以有少量样书,分赠友好。字数甚少,图尽黑白,想可办到。书字印章及《鸽铃赋》标点,能套红,则感甚。”

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亲自做责任编辑,并签署意见:“早点安排,但非急件。年内出最好;版式大方点;此稿提前看一下,等我回来即签发。(不要找作者,有问题等我解决。)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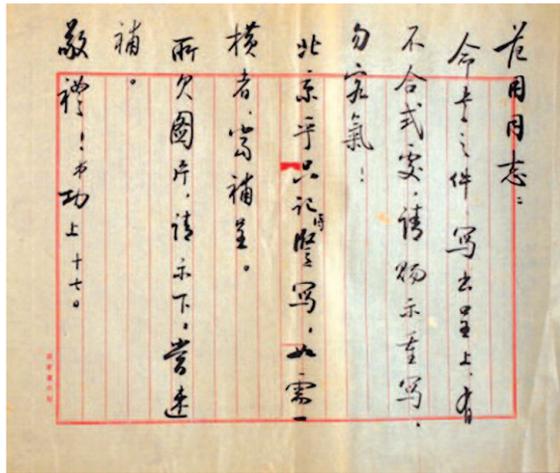
沈昌文同时给范用一封信:“范用同志:王世襄专程找我,谈《鸽哨》事。谓此书只求快出,次求印装质量。他8月去港,一定要带去。附上给‘三联’公函一件。”

若然,可否用小32开平装,文排五宋,横排,即交双桥印刷厂排印,否则恐要误事。如直排,如文排五仿,繁体,怕

## 难忘的书与人

# 范用与王老、启老

汪家明



启功给范用的手札

都来不及。如胶印,照排,怕又因篇幅大,印数也少,而且成本太高。只是王要求书前后题签等要双色套印,是应照办的。王向我恳切说明,时间因素是第一的。他怕搞得精益求精,使他未能带出去,影响使用。你看怎么办好?

范用在信的下方签意见说:“既然如此,就请按你们的要求办,我就不设计了,免得难办。我原想设计成一本别致、文雅一点的书。”

可是不知为何,这部稿子1989年9月才出书。

1993年8月21日,范用给苑兴华写了一封信:“我一直希望出版一部王世襄文集(选那些可读性很强的文章,如谈鸽哨、秋虫、葫芦、竹刻之类),哪一个出版社出都可以,三联出,更是我所希望的。我不断做催生工作,总算说动了王先生,所以我曾首先写信给您,现在才知道此信未能转到,不知丢失在哪里了。”

两个月前,人民出版社(东方出版社)表示非常愿意出这部书,甚至不惜成本,亏本也出。近日此事起了变化,王先生……怎么也不愿给人民出了(此事董秀玉知道)。在此情况下,我又想到何不仍由三联

来出。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,可以垂之久远。可以用与港台(出版社)合作的办法出版,我想港台一定有出版社愿意与三联合作,此事董经理很容易办到。

目前王先生正在编这部书,我仍然以一个局外人催生。请你们研究一下。如三联无意,我再介绍到别的出版社去(深圳有一出版社愿出)。

几天后,苑兴华写了一份选题报告,报告中说:“范用同志几次提及王世襄文集事。我认为这本书有情趣,有格调,可保留国粹使之‘垂之久远’。我意可以接受下来(据老宁讲,王先生即将编就)。如能从港台找到合作者则更好。如有此意向,我去王先生处进一步洽谈,有关篇目、字数。附:范用信二纸。”董秀玉即日批复:“拟同意选题。”

编辑过程中,范用又几次给苑兴华写信。其一曰:

王世襄先生来电话,说他的文集即将付印。出版这部文集,是他的一件大事,一生留下的唯一有点用处的东西都在这里了。希望印得讲究一点。

我告诉他,早在廿年前,我就有一个意愿由三联出版一部王世襄文集(还有一部启功文集)。现在我退休了,能看到

能实现,感到欣慰。我想三联也会重视它的印制质量。当然更应十分讲究,也有困难。如果能和港台合作在外面印一印,那就不成问题了。

我特转达他的意见,以及我的想法。请在研究工作时向董秀玉经理汇报一下,如有可能,也望就此事与王世襄先生商量一下,听听他的意见。我有一次请他问问启功先生,可否也编一部文集(交三联或别处出版都可以)。

董秀玉在信上签了意见:合约签订后我们即商定用料等问题。

完全没想到,这部书前后用了整整六年多才得以出版,成就了一部煌煌巨制:《锦灰堆——王世襄自选集》(全三卷),1999年8月出版,二十开。第一卷四百七十四页,第二卷四百七十五页~八百一十六页,第三卷四百一十页。一、二卷横排;三卷竖排,手书。分平装精装两种。一、二卷收集了王世襄八十岁以前所写的大部分文章,计一百零五篇,编为:家具、漆器、竹刻、工艺、则例、书画、雕塑、乐舞、忆往、游艺、饮食、杂稿等十二类。共有线图二百三十四幅(夫人袁荃荃手绘),黑白图四百二十四幅、彩图二百五十五幅。第三卷选收王世襄历年所作的诗词一百二十首,由他和夫人手书影印。

《锦灰堆》出版后获得极大好评,奠定了王世襄作为中国国学一方镇镇的地位。其间范用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。其后十年间,三联书店又出版了王世襄的《明式家具研究》《锦灰二堆》《锦灰三堆》《锦灰不成堆》等一系列著作。在他去世那年还出版了王世襄文章选本《京华忆往》,首印一万册,一个月内销完。

1993年11月28日,启功给范用写了一封信:

范老:手教敬悉,“鞍山钻石城”亟写出求教!我公挚友,何敢以世俗手续奉于?只问合格否耳。《启功絮语》正在印刷中,上海《文汇报》当未见。全书即将出版,序言不忙着看。

王公翰安转来我公厚意,但拙作杂文不多,亦未专事收集。今后谨当开始剪存,待够一册,先行求教!能否值得出版,殊不敢自信也!

1994年2月21日,范用致信苑兴华:

我想再推荐出版一本《启功文集》。启老写有不少篇文史杂文,发表在报刊,序跋分印在各本文集,似可建议启老搜集印一本集子,可与王世襄文集并列三联长销书目。

请与有关领导一议。我手头有一些书刊以供参考,如需要,请取。我曾向启老提出,他很谦虚,说以后再谈。我觉得现在就应当办。

董秀玉看了范用的信,明确提出:“这类专家都是国宝,他们的书应列入我们的选题。可去要来资料选编,并去拜访。”

其实早在1986年,范用就有出版启功的另一本书《论书绝句》的想法。此书先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,内地版已交山东齐鲁书社,经范用与齐鲁书社“恳商”才改交三联书店。范用认为,启功为中国一大家,三联书目中应当有一本他的著作。但考虑到当时正值三联恢复独立建制,财力有限,而发行渠道尚未通畅,又拖了一年才正式提出选题。范用在选题报告中写道:

本书……来稿已两年多,收录著者历来评论书学的七言绝句一百首,每首绝句后另有短评,纵论历代书法名家及书法名迹;或评名家之得失,或论书迹传本的优劣真伪,词简而意赅,见解每有独到之处。不仅是有关书学的绝句和评论,且可视为小品文佳作。启老文字有特点,人所称道。

请董、沈、戴、倪阅

董秀玉认为:今年的条件可以印一些这样的书了,赞成稿。沈昌文、戴文葆、倪子明都签字同意。得到确切消息后,范用立即给启功写了一封信,信中丝毫没有流露自己为这个选题所做的工作,反而像局外人一样说:“《论书绝句》脱销已久,近从三联书店得悉,将重印出版,并且设计新的版式,印得更讲究些。”作为本书设计者,他向启功提出封面设计和内页都需用原稿手迹。启功回信说:

拙著蒙亲自设计,实为厚幸,亦弥增惶悚。

所设计各端,悉遵规划……至于拙著手稿,原本已归港上友人,印本中者俱用照片。其印片前曾以一份奉上,今既不存,北师大只存印片一份……又想到如只用数首,是否可由功另写做起草之样,字稍行草,略加修改,做假手稿,虽未免欺人,亦可避免雷同,而稍见别致,不知高明以为如何?

这一段文坛佳话亦可看到启功之另一面。



# 笔会

乡间·1  
(国画)  
蒲玉杰

# 栽竹

谭然

家看到竹园,徘徊竹下很是向往,唯一能实现的只能在花盆里种几棵。我家有两盆竹子,冬天饱经风霜,大部分凋萎了,初春的风会刮掉很多竹叶,满地都是,扫起来仍旧堆在花盆里当作肥料。经过几场春雨,竹竿变青,竹叶嫩绿,新笋也冒出来了。

两盆竹子大小有别,一盆是凤尾竹,刚种下时一大从叶子披离茸茸,细小巧可爱。后来失于调理,竹叶渐渐长大,竟然变异为普通的大叶竹子。凤尾竹很少人画,大概太过琐碎,不易描摹。自从叶子变大,茎干挺拔,一枝一

叶精神起来,倘若搬到白墙前面,连影子都成了水墨画。我小时候附近有人家住平房,门口一排高大的水杉,树下空地上种了几丛凤尾竹,不断生发连成一片,像篱笆一样形成屏障,偶尔有茛苕萝缠在上面,开出五角星般的红色小花,花瓣有一层绒布质感,茛苕萝蔓细长,光滑柔软,叶子如同羽状,茂密细腻。和凤尾竹长在一起,虽是简单的绿叶红花,但是气质上很般配。暑假正逢茛苕萝盛放的季节,我常常跑去观看,留下很深的印象。自从我种了凤尾竹,某一天忽然想起那个场景,尽管

竹子只有一小丛,不及记忆里人家的茂密,却也觅来茛苕萝种子,单独种一个小盆,和竹子并排摆着。每年仲春时播种,夏天,茛苕萝开花了,衬着翠竹,映着太阳格外鲜红。

还有一盆是箬竹,这种竹子在野外也长不高,像灌木丛,但叶子很大,乡下房前屋后,靠近水沟水塘的地方长满了。夏初,农人采摘以后在柴灶大锅里煮过,一片一片理好,十张一叠,用麻线捆住,再十叠一捆,扎成一堆一堆的,挑到城里来卖,只要一看到卖菜摊上堆了成堆的粽叶,我们就知道端午节快到了。箬竹移到盆里缩小很多,但是还可以包粽子,包那种极大的粽子,小孩子一口一个,我小时候家里有人包,用一根线系成一串,过节时给小孩拿着玩,主要是玩,吃的话肯定没有大个的粽子过瘾。

这盆竹子是前老十多年前送我的,那年春天他去近郊山里扫墓,从路边拔了一丛回来,分成两份,一份自留,一份给我。用他的话说,虽然物极普通,但

是“品格不坏”,种在盆里玩赏,还比花市里卖的那些名贵品种差。后来他家旧屋拆迁,搬到女儿家楼房里去了,满院子的花花草草带不走,随身除了笔墨纸砚,只能种几盆小玩意聊胜于无,这盆箬竹是其中之一。每隔一段时间我去看望他老人家,喝茶茶聊聊天,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近些年他年纪大了,难得出门,身边唯有植物最能体现季节,这也是我们常谈的话题。

有一回冬杪年尾,我买了几头水仙送了,老人领我到阳台上赏花,有的枯萎了,有的长势不好。只有箬竹还有绿意,白天晒晒太阳,晚上移到客厅沙发边上,只要浇点水就行了。老人家跟我说,原来家里院中那株樱花,自从老人搬走以后,旧屋待拆,无人照看,渐渐被虫蛀死,书斋也不便再叫“樱花危楼”。幸而有几盆草花翠竹,可以相伴,从此就叫“绿意轩”吧。老人还说这个名字纪晓岚用过,大概记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面,他让我也看看这本书,里面小故事多,有趣得很。